

環繞著北平外交季的種種問題

尹慶耀

五月八日蘇聯聲明，不參加一九八四年七月在美國洛杉磯舉行的奧運會。九日，莫斯科宣佈，其第一副總理阿爾希波夫（I. V. Arkhipov）延期訪問中共。二者似乎都是拖到最後才突然決定。這些事件的意義及其彼此之間的聯繫，不宜作誇張性的推論。但即使另有偶發性的原因在，也難免令人感覺到當前世局、特別是華盛頓、北平和莫斯科的關係，的確是相當微妙。

把共黨世界的名詞引用到自由世界，人們會覺得很不習慣。其實，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到中國大陸的「和平之旅」，確係共黨術語中的「統戰」旅行。而當時周恩來在車上對他說：「你的握手越過世界最遼闊之海洋——二十五年沒有交往之海洋」^①。更是標準的統戰詞令。

尼（克森）季（辛吉）時代只講多元平衡外交，不講聯中共制蘇聯，中共也不講聯美制蘇^②。一九七五年當時，美國的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認為在美國、中共、蘇聯的三角關係中，美國享有在「中」蘇二者間縱橫捭闔的自由，可以充分利用這兩者間極不相容的敵對情勢^③。

不管這叫做統戰或玩牌還是什麼其他名稱，但美國並未長期保持如摩根索所說的優勢地位。七十年代後半蘇聯奪得這種優勢，八十年代前半這種地位轉入中共之手。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蘇聯進軍阿富汗，形成東西方對立，美國曾經杯葛一九八〇年在莫斯科舉行的奧運會，並對蘇聯採取部分

註① 尼克森：「新中國牌」，美國《新聞週刊》（一九八四年四月三十日，但提前出版）。所引見香港：《文匯報》（同年四月廿五日）第二版譯文。

註② 周恩來在一九七三年三月初對黨內所作的關於目前國際局勢問題的講話中說：「我們不能提『聯美反蘇』，雖然有些事情上我和美有共同點」。見《中共機密文件彙編》（臺北：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六十七年四月初版），三六〇頁。

註③ 一九七五年七月下半月美國參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未來外交政策研究及發展小組委員會舉行多次聽證會，所引為摩根索教授在聽證會中的證詞。

制裁措施。但美國與中共的關係，也在又聯合又鬭爭中。一九八一年六月九日中共對美國出售防衛武器給中華民國提出正式異議，此後北平即不斷借題發揮，與美國發生齟齬。

美國與蘇聯關係惡化，促成中共想乘機利用，以便獲得在三角鬭爭中的優越地位；中共與美國的齟齬、冷淡，也促成蘇聯想從中分化。這就構成八十年代初期國際局勢的微妙變化。

據中共「世界經濟政治研究所」出版的非公開雜誌「世界經濟與政治」所刊「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的王保勤等三人合撰的「八十年代的中、美、蘇關係」一文透露，一九八一年十月廿二至廿三日在墨西哥舉行的坎昆（Cancun）高峯會議中，美蘇對立激化，中共乃乘機調整其對外政策，即：加強獨立自主方針，與美國保持一定距離，同蘇聯改善關係。中共認為在美蘇之間採取有主導性的彈性政策比較有利^④。另一方面，一九八二年三月廿四日布里茲涅夫在塔什干演說，向中共發出改善關係的呼籲，而中共也作了不同於往昔的反應。這一則是由於雙方的需要，再則也都是三角鬭爭的手法之一。同年九月中共「十二大」策定「獨立自主」外交方針。從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向大會提出的報告中，可以體會得出，中共的「獨立自主」原則，可以用以在美蘇之間保持有彈性的平衡運用，可用以鼓動東歐國家遠離蘇聯，可用以鼓勵西歐疏離美國，也可以聯合第三世界國家反對兩霸，其幅度與速度，則視需要與現實條件而定。

一九七八至八〇年，中共與蘇聯關係惡化，與美國較為接近。但一九八一年下半年起，中共為美國對華軍售問題、湖廣鐵路債券問題（一九八二年九月美阿拉巴馬州地方法院判決中共應負清償義務）、紡織品貿易問題（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三日雙方談判破裂，美限制中共紡織品輸入，中共限制購買美農產品以資報復）、舒茲國務卿演說支持中華民國在亞洲開發銀行（ADB）的會籍問題（一九八三年三月八日中共「外交部」公開予以批評）、女網球選手胡娜投奔自由問題（一九八三年四月中共向美政府提出抗議，並中止雙方於一九八一年所簽文化交流協定）等等，不斷威脅美國，聲言不惜使雙方關係倒退。其間，雖有美國前國務卿海格（一九八一年六月中旬）、助理國務卿何志立（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一日）、副總統布希（一九八二年五月七至九日）、國務卿舒茲（一九八三年二月二至六日）等相繼訪問中共，並有「八·一七公報」（一九八二年）的發表，但雙方關係並不圓順。另一方面，中共與蘇聯的關係却漸有增進。一九八一年七月六日，「人民日報」刊出解成章的文章「實行睦鄰友好政策和平解決邊界問題」，文中表示希望能夠解決中印、中蘇、中越的邊界問題^⑤。同年十一月，中共參加第廿一屆世界體育錦標賽的代表團，在莫斯科受到歡迎，並接受「蘇中友好協會」的款待。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四日，蘇聯科學院院士、蘇聯外交學院院長、「蘇

註④ 轉自日本：《讀賣新聞》（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第五面。原報導僅稱「世界經濟與政治」雜誌係最近出版，未註明月日。

註⑤ 轉自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一年七月七日）第二版。

中友好協會」第一副主席齊赫文斯基（S. Tikhvinskiy）負有未經宣佈的任務飛抵北平，逗留達兩週之久。一九八二年十月，「中」蘇副外長級談判改稱「磋商」，在北平舉行，雙方同意開放六十年代關閉的新疆省兩處邊界貿易站。同年十一月布里茲涅夫死亡，中共「外長」黃華奉派參加葬禮，與新任總書記安德洛波夫握手言歡，並與蘇聯外長葛羅米柯就改善雙方關係交換意見，為二十年來的首次。截至一九八三年底，中共和蘇聯的實質關係不斷小步前進，文化、體育、旅遊等交流業已恢復，學術團體互相訪問，交換了留學生，邊界貿易部分恢復，雙方貿易總額一九八三年八億美元，一九八四年預定為一二億美元。胡耀邦聲稱至一九九〇年將增至五〇億美元^⑥。這一段時間的中共對外政策，符合「世界經濟與政治」雜誌所透露的轉變，也如同化名愛德蒙·李（Edmund Lee）的中共留美學者在美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一九八三年夏季號發表的文章所稱，是「對美後退，對蘇前進」^⑦。

二

中共當前的外交可稱為「實利」外交。這當然不是說中共已放棄了共黨立場或革命目標，那是永遠不會的。不過，如今美蘇對立，中共和雙方保有相當關係，它就可以巧妙運用，多方獲利。為此，中共雖攻擊日本復活軍國主義，但胡耀邦却與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互訪；中共雖在「臺灣」、中東、中美洲等問題上抨擊美國，但趙紫陽却與雷根總統互訪；中共雖提出「三大障礙」來指摘蘇聯，但却邀請蘇聯第一副總理阿爾希波夫往訪，使彼此官方接觸提升到副總理級。在這種情況下，中共無法對某方長期後退，也不能對某方筆直前進。

利用微妙關係獲取實利，中共確有若干成就。在對日關係方面，根據中共本身統計，一九七二至一九八二年的十一年間，雙方貿易累計總額達五五四億美元，在日本和中國大陸共計興辦合資經營企業二十一家，雙方銀行間的協作不斷增進，一九八三年九月雙方在北平簽訂了避免雙重徵稅的協定^⑧。日方資料透露，截至一九八三年底，過去四年半時間內，外資與中共興辦的合資企業計十六國一一二家，其中以華僑資本為中心的香港企業佔六八家，美國企業一八家、日本八家，其餘為歐洲資本^⑨。日本給

註⑥ △美聯社／電，臺北：《聯合報》（一九八四年三月廿日）第一版。

註⑦ 轉自日本：《讀賣新聞》（一九八三年六月六日）第五面。

註⑧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廿一日）第二版。

註⑨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四年五月一日）第四面。

予中共的第一次日圓貸款（一九七九／八三年）三、〇〇〇億日圓（一二億七、〇〇〇萬美元）。第二次貸款四、七〇〇億日圓（約二〇億美元），用於：（一）擴充衡陽至廣州間鐵路運輸能力；（二）鄭州至寶雞間鐵路電氣化；（三）建設秦皇島船塢；（四）擴充連雲港；（五）擴充青島港；（六）擴充天津、上海、廣州電話網；（七）天生橋水力發電。日本擬出售大型電子計算機及核能發電設備給中共，通產省派遣大型投資調查團，於一九八四年四月八日赴中國大陸訪問四天。日本港口建設專家鳥居幸雄應聘為天津港務局最高顧問。

一九八二年趙紫陽訪日時，曾提出「中日關係三原則」。一九八三年十一月胡耀邦訪日，又加一個「互相信賴」，成為「和平友好、平等互利、互相信賴、長期安定」四原則。一九八四年中曾根康弘訪問中共，和胡耀邦同意成立「日中友好二十世紀委員會」以研究邁向下一世紀之際如何加強雙方合作關係的途徑和方法^⑩。

在對美關係方面，中共「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主任王耀庭透露，雙方建交後的五年間，雙邊貿易額累計達二二二二億美元（一九八三年四四億美元），美國在中共對外貿易中佔第三位^⑪。中共「對外經濟貿易部」有關人員透露，到一九八三年底，美商在中國大陸投資總額已達六億七、六〇〇萬美元，已批准的「中」美合資經營企業有廿一家（目前已有半數以上正式開業），佔全部「中」外合資企業一八八家的百分之十一^⑫。雷根總統於一九八四年四月廿七日在「人民大會堂」發表的演說中透露，美國公司在合資企業和中國近海石油勘探方面已經投資七億多美元。大約有五十家「中國公司」在美國設立了分公司或辦事處。根據雙方「聯合科技委員會」執行的一項協議，雙方在廿一個專家領域裏建立了交流項目^⑬。另據中共「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王炳南對「新華社」透露，一九八三年中共接待了美國旅遊者一六萬八、三〇〇人，比一九七九年增加了近三倍。自一九七九年以來，「中」美之間，已有十對城市結為友好城市，有十二對省、州建立了友好省、州關係^⑭。雷根訪問中國大陸期間，美國和中共正式簽訂了：關於對所得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協定；關於雙方文化協定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五年執行計劃；科學技術情報合作議定書；工業科技管理合作議定書。此外，雙方還草簽了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協定^⑮。美國將於五月間在瀋陽設立它在中國大陸的第三個領事館。

註^⑩ 參閱香港：〔文匯報〕（一九八四年四月廿八日）第一八版。本為日本駐港總領事藤井宏昭在香港喜來登酒店的演說，原刊〔新日本月刊〕第十四卷第一期。

註^⑪ ^新華社▽（一九八四年三月廿四日）北平電，香港：〔文匯報〕（同月廿五日）第一版。

註^⑫ ^新華社▽（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六日）北平電，香港：〔文匯報〕（同月十八日）第二版。

註^⑬ ^新華社▽（一九八四年四月廿七日）北平電，香港：〔文匯報〕（同月廿八日）第三版。

註^⑭ ^新華社▽（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七日）北平電，香港：〔文匯報〕（同月十八日）第二版。

註^⑮ ^中國新聞社▽（一九八四年四月三十日）北平電，香港：〔文匯報〕（同年五月一日）第二版。

中共所獲，就中國大陸而言，確係杯水車薪，而且在共黨的官僚體制下，經濟效益不易提高。但我們不能不說中共從美國、日本乃至蘇聯，確實獲得了一些實利。

三

中共以十九響禮砲歡迎了中曾根，對雷根就用了廿一響禮砲。根據香港「文匯報」的報導，中共歡迎雷根是「紅地毡、禮砲、香檳、歡笑」^⑯。釣魚臺賓館中「整修一新的元首樓」，「在寬敞明亮的元首臥室裏擺著一張仿明朝時期的龍床。床架四周飾有蘇州藝人雕刻的龍頭。整個床架重一點二噸，尺寸達九平方米。此外還有一間擺著西式傢具的夫人臥室」^⑰。雷根總統答謝宴設在北平最豪華的長城飯店中具有中國宮殿建築風格的大宴會廳，中共「特派專人從廣州空運一千一百枝新鮮劍蘭，並從香港買來一千一百隻與劍蘭花同色的粉紅色蠟燭」作爲宴會裝飾，「宴會餐桌上的號碼盤全部是鍍銀的，也剛從香港進貨」^⑱。

本來，一九八四年春，可稱爲北平的「外交季」。中共安排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於三月、美國總統雷根於四月、蘇聯第一副總理伊·阿爾希波夫於五月相繼訪問中國大陸，這是「平衡」外交的表現，也是左右刺激、多方獲利的統戰手法。不過，阿爾希波夫訪問中國大陸也是老早約定的，但中共正式宣布是在雷根抵達大陸的前一天即四月廿五日，其方式是由中共「外交部」新聞發言人俞志忠（「新聞司」副司長）在新聞發佈會上宣稱，尼日爾（Niger）共和國最高軍事委員會主席、國家元首賽義尼·孔切（Scyni Kountche）准將和夫人，應「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李先念的邀請，將於五月十日到大陸進行正式友好訪問。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爾希波夫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邀請，將於五月中旬訪問大陸。塞舌爾共和國計劃與對外關係部長馬克西姆·費拉里，應「國務委員兼外長」吳學謙的邀請，將於五月二至八日到大陸進行友好訪問^⑲。

阿爾希波夫只是第一副總理，自然不能與雷根相比。但中共招待雷根是過熱，對阿爾希波夫往訪的新聞發布方式過冷。而且，據說阿爾希波夫也定於五月十日開始他的訪問，和孔切同時，後者又是一個元首級，兩人同時出現在北平，阿爾希波夫可能遭受第二個冷遇。如果說中曾根、雷根、阿爾希波夫相繼訪問北平會抬高中共的身價，阿爾希波夫就是在冷遇中爲中共抬轎子。因

註^⑯ 「美保守派的三轉變——里根訪華述評之二」，香港：「文匯報」（一九八四年五月三日）第二版。

註^⑰ 「釣魚臺準備迎接里根」，香港：「文匯報」（一九八四年四月廿日）第二版。乃△新華社▽（同月十九日）電所發特稿。

註^⑱ 「里根訪華，宴設長城飯店；千枝蘭燭，港穗空運北京」，香港：「文匯報」（一九八四年四月廿四日）第一版。乃△中新社▽（同月廿三日）電所發特稿。

註^⑲ 參閱「新華社▽（一九八四年四月廿五日）北平電。

此，他的延期往訪，就並非是不可理解的。

阿爾希波夫雖只是蘇聯三個第一副總理之一，但對中共說來，他的訪問却賦有重要的意義。首先，他是一九六九年前蘇聯總理柯錫金訪問北平以來，到中國大陸訪問的蘇聯最高級官員；其次，他主管對外經濟聯繫事務，且是五十年代蘇聯技術專家在大陸援助中共建設的駐北平負責人，和陳雲是朋友；復次，據傳他預定訪問大陸的日程是從五月十到二十日，將與陳雲及中共副總理萬里就擴大雙方中、長期經濟關係交換意見。據日本「共同社」較早報導，阿爾希波夫訪平時，將與中共就包括原子爐在內的核能發電機器提供中共問題舉行會談。關於鈾的開發技術及和平利用同位元素(isotope)等合作問題，也將舉行檢討。中共還希望引進蘇聯的煤炭開採技術。此外，中共已與美國草簽了核子合作協定，它也將與西德簽訂此項協定。中共希望與衆多國家從事核子合作，俾作比較^{②0}。因此，阿爾希波夫突然延期訪問中共，自然會引起各方的揣測。

對於此一問題，香港「文匯報」駐平記者程翔有一篇「述評」，倒頗值得我們參考。述評說蘇聯「突然宣布取消一阿爾希波夫從五月十日開始的「訪華計劃」，使北平西方外交界人士感到意外。又說，「中」蘇雙方對此都不願作出任何解釋。但西方外交界人士指出，蘇聯以「還未準備好」為理由，顯然是「托詞」。述評引述大家猜測的幾個原因是：首先，蘇聯對雷根訪華後顯示出來的「較為密切的中美關係，表示不滿」。據一位熟悉蘇聯事務的外交官說，從四月十八至五月四日，雷根訪華前後，蘇聯的新聞機構，共發表了十五篇評論，計「塔斯社」一篇、報刊八篇、電視臺四篇、電臺二篇，都是攻擊雷根訪問中共的。這些評論攻擊中共和美國的關係，是「建立在損害第三國利益的基礎上」，（據「紅星報」的評論）認為美國將通過此行，把中共拉入以美、日、南韓為主的以反對蘇聯為目標的亞洲軍事聯盟。說中共要求消除的三大障礙，涉及蘇聯安全的利益，涉及蘇聯與阿富汗、越南、柬埔寨和蒙古的合作。中共本身這些要求就妨礙了「中」蘇關係正常化（「塔斯社」五月三日評論）。

述評說，其次，最近越南和阿富汗形勢的發展，使蘇聯感到在這個時刻訪中共，不太適合。越南最近侵犯中國領土，莫斯科曾在五月四日發表了一個「塔斯社」聲明，除全面偏袒越南外，還隱晦地恐嚇了中共，他的聲明說，「那些想教訓已經獨立的國家的人，應當注意歷史的教訓，認為一九八四年對越發動的侵略，會產生一九七九年那一次不同的結果和效果的，那將是極其缺乏遠見的」。連日來，蘇聯發動其工會、共青團等羣衆組織，舉行所謂支持越南的「反華集會」。

述評又指出，蘇聯在雷根訪「華」期間，對阿富汗發動一場空前龐大的軍事攻勢，這是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蘇聯入侵阿富汗以來，最大的一次攻勢，對阿富汗游擊隊進行飽和性的轟炸。據「美國新聞和世界報導」五月七日一期分析，蘇聯在雷根訪「華」期間發動這場攻勢，似乎在向「中」美兩國表示，蘇聯決心留在阿富汗不走。越南和阿富汗問題，是「中」方指出的三大障

註²⁰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四年五六日）第七面。

礙之二，而蘇聯近日來的行爲，不但無助於排除三大障礙，而且使到形勢更趨惡化，在這種情況下來「華」訪問，顯然不是時機^②。

據筆者所知，莫斯科的華語廣播，也不時反覆作與述評所述類似的攻擊。廣播甚至指稱雷根訪問中國大陸，其意義是「十足的競選活動」。說雷根「決定打中國這張牌」。指雷根「把賭注下在反共主義上，把反共主義看作能使他得到包括軍事工業綜合體在內的各種反動勢力的支持的主要因素。所以在訪問中國期間，他這麼喋喋不休的大肆鼓吹美、中兩國在他宣布的對蘇聯、對社會主義的十字軍遠征範圍內進行戰略合作的必要性」。這無異說是中共已加入雷根的反共行列，因而廣播提醒或者說警告中共，「對於他們（美國一筆者）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像蘇聯、民主朝鮮、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特別提出這兩個國名，值得注意一筆者）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樣的敵人，忘記這一點就意味著忘記帝國主義的實質」^②。

希望中共變成一個不同於其他共黨的共黨，固然不可能；說中共已倒向反共陣營，更嫌誇張不實。其實，在雷根抵達中國大陸之前和在大陸時，四月廿至廿一日，蘇聯首次出動 TU-16 型戰鬥轟炸機，對阿富汗境內極具戰略價值的潘希爾峽谷 (Panjshir Valley) 進行高空密集轟炸。廿四日，蘇聯地面部隊兩萬名，坦克及裝甲車五百輛，武裝直升機八十架，開始向該峽谷移動。廿七日，在數千名傘兵配合下，對潘希爾峽谷進行慘烈的爭奪戰。同樣規模的戰鬥，也在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 (Herat) 和西南的坎達哈 (Kandahar) 地區進行。那是對美國和中共示威。另一方面，四月廿一日夜河內廣播說，從十八日起連續三天，中共對越北六省，進行砲擊及越界攻擊。那是對越南在柬行動的牽制，也是打給雷根看的。其實，中共提出三大障礙，一方面也是說給美國聽的，其意義和安排美國政要遊覽長城是相同的。

四

阿爾希波夫訪問中國大陸，只是延期，不是取消，他大概還是會去的。而中共和美國、蘇聯又聯合、又鬭爭的局面，也會持續下去。雷根總統大陸之行，自然有其影響，但各方若干基本立場，並沒有顯著的變化。美國和中共在「臺灣問題」上仍是平行線（不相交）；中共仍然支持金日成於一九七三年六月廿三日所提「五大原則」中由南、北韓合組高麗聯邦加入聯合國的「和平統一方案」（一九八〇年再提），以及一九八四年一月北韓所提「三邊（美、南、北韓）會談」，不理會美國所提的「四邊（加中共

註^② 程翔：「西方外交人士看蘇對華政策」，香港：《文匯報》（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一日）第二版。
註^② 《和平與進步廣播電臺》（一九八四年五月八日）廣播評論。

)「會談」，中共一再聲明它不參加「交叉承認」（美、日承認北韓，中共、蘇聯承認南韓），仍然叫囂美軍撤出朝鮮半島。……然而，把一向堅決反共的美國現任總統邀請到中國大陸訪問，自然會給北平的外交季增添一些不尋常的意義。美國和中共的核子合作協議，未能獲得中共符合禁止核子繁衍的保證，勢將發生不良後果。據傳蘇聯已準備出售原子爐給中共而不附任何條件，那也是阿爾希波夫往訪時主要議題之一^②。

當然，中共所獲也並非全盤收入。首先，雷根在中國大陸的講演詞，並不是中共所歡迎的；而中共轉播時，將講詞內容予以刪除或增添，也不是美國所能滿意的。雷根總統於一九八四年四月廿七日在北平「人民大會堂」講詞被廿八日「人民日報」所刪除的計有：談美國本身「如何從每一個農民全年靠馬匹和鋤頭去耕作，生產糧食給一家四口活命，到如今一個農民用最現代化的機械耕耘，生產足夠養活七十五個人的糧食，使美國成爲世界糧倉」的一段；談「美國是由尋求崇拜上帝的自由，和信仰上帝會以智慧、力量、仁慈、熱愛導引他們的生活的人羣所建立的」一段；「我們知道，除非我們願意與所有人分享自由，否則我們自己將不能享受自由。我們知道，除非我們全體都受到以平等待人的法律的保護，否則我們的自由將不會真正安全無虞」的一段；「喬治·華盛頓告訴我們，我們將在神聖的自由人的兄弟情誼下結合在一起。阿布拉罕·林肯爲美國的民主精神下定義說：若無他人的同意，沒有人有權利管理他人」那一段；「這些偉大的原則滋潤美國的靈魂。而工作的尊嚴、鄰居的友誼，以及家庭的溫暖，更充實了它的價值」那一段；「信任人民，這幾個字不僅是美國歷史的中心與靈魂，也是現在世界人類進步的最重要力量。忽略此重要事實的人，將使他們的國家在一九八〇年代及其後年代，在爭取經濟領導地位的世界性競爭中落後」那一段。此外，「人民日報」有「我們無疑會看到，個體企業會有長足發展；農村會大造住房；農產品數量會迅速上升；農民的平均收入會大幅度增加」（指大陸言——筆者）數語，却是雷根講詞原文中所沒有的。

由這一刪添講詞事件，可讓我們體會到，希望中共經由經濟開放走向自由化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我們也認爲，中共要想完全阻止雷根講詞會對大陸人民特別是知識青年產生若干影響，同樣是不可能的。

這裏要補充說明的是，「人民日報」刪去的雷根講詞，還有抨擊蘇聯的一節。四月廿八日晚中共電視轉播那篇講詞時，又一次刪除了雷根鼓吹自由和攻擊蘇聯的部分。據中共「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齊懷遠解釋說：「中國媒介廣播雷根總統涉及第三國家（指蘇聯）的言論是不合適的」^②。儘管如此，蘇聯仍深感憤怒。五月三日晚，「塔斯社」發表評論，指雷根在中國大陸的言行是「反蘇的挑釁行爲」，同時攻訐北平領導人只強調同美國的共同利益，不關心美國反共主義外交政策的危險性。評論指稱中共

註^① 臺北：「聯合報」（一九八四年五月八日）第一版。按中共「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方毅四月訪日時，曾作此透露。

註^② 香港：「明報」（一九八四年四月廿九日）第四版。

領導的姿態，是違反中國人民的利益的。對於雷根政府的霸權主義政策，中共內部也有人具有警戒心，雷根的訪問並不受全體中國人民的支持。評論特別指名抨擊鄧小平，說他支持美國增強軍力的發言，和「中美兩國在許多國際問題上有共同點」的發言，是表明了中共「親美」的立場^㉔。

中共近年來爭取北韓不遺餘力。一九八三年五月五日，卓長仁、安健偉等六人，迫使中共民航機降落南韓春川，韓國政府擬藉此事件與中共建立正式聯絡關係，對此，中共曾有正式外交文件致送北韓駐平「大使館」，指南韓「一廂情願」並叫嚷美軍撤離朝鮮半島^㉕。可是，最近北平對漢城發動一連串統戰攻勢，也是事實。諸如允許中國大陸的韓人歸國省親或定居（現已超過百人），加強體育交流，中共的民航直昇機於一九八四年四月中旬，降落在韓濟州島加油^㉖。中共所為都是無關宏旨的細微末節，又一再派員向北韓解釋，且公開聲言同南韓的各種交流與承認問題無關。揆其目的，一在破壞中韓友誼，一在向希望緩和朝鮮半島局勢的美、日表態，如中共允代日本為日本女子嫁給北韓人的歸國問題向北韓試探^㉗，並願在美國與北韓之間傳話等皆是。而雷根訪問大陸之後，舒效前往南韓作簡報，胡耀邦也於此時（五月四日）訪問北韓，似與舒效負有同樣任務。據傳北韓曾因中共允許南韓選手入境，參加一九八四年二月末在昆明舉行的網球賽一事，向中共提出抗議，事經北平否認。四月十一日，金日成對「塔斯社」代表團談話，強烈反對「美、日、韓三角軍事同盟」的形成，抨擊日本復活軍國主義。又提到「第三世界國家對日本抱有幻想」。這些話符合蘇聯的立場，而與美、日勾搭緊密又擴大對日經濟合作的中共，就不一定喜歡聽。又同一天，蘇聯駐平壤大使將蘇共總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契爾年科（Konstantin U. Chernenko）祝賀金日成七十二歲生日（四月十五日）的祝詞及賀禮面致金本人^㉘。而胡耀邦訪問北韓甫告完畢，金日成即於五月十八日啓程，搭乘火車經由中國東北轉往蘇聯訪問（為十七年來之首次），實頗耐人尋味！

五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八日，胡耀邦在歡迎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主席馬爾科維奇率領的代表團的宴會上發表談話

註㉙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夕刊第二面。關於鄧小平發言，請參閱香港：《文匯報》（同年四月廿九日）第一版。

註㉚ 中華民國敵後工作人員會獲該文件影印本，參閱臺北：《聯合報》（一九八四年五月十八日）第二版。

註㉛ 日本：《日本經濟新聞》（一九八四年五月一日）第七面。

註㉜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四年四月卅日）第一面。
註㉝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三日）第七面。過去普通年月（非整壽）金日成生日，蘇聯最高當局未有如此隆重祝福，又平壤廣播金日成親自接受賀禮，亦屬異例。金日成七十歲生日時，布里茲涅夫會有賀電及禮物，由北韓首相李鍾玉代表接受。

，他指出中共的獨立自主外交有「三不」，即：不依附任何大國或國家集團，不屈服於任何大國的壓力，不同任何大國結盟^㉙。這是中共當前平衡外交的神髓。

不過，平衡外交有如走鋼索或許比馬戲團的走鋼索更難些，因為外交上的平衡桿並不完全操在走鋼索者自己手中。中共目前拉攏美、日，但也準備同蘇聯改善關係。撇開意識形態不談，中共和蘇聯直接接壤，邊界線綿亘數千公里而又強弱易勢，中共不會傻到長期和蘇聯對抗。過去，由於美蘇對立，中共調整了它的對外政策；又在北平和華盛頓關係冷淡時，蘇聯向中共發出改善關係的呼籲。一九八二年以降，蘇聯對中共的抨擊，頗能自我克制。一九八三年九月，美國國防部長溫柏格（Casper Weinberger）訪問中共，決定了雷根將與趙紫陽互訪，蘇聯立即恢復對中共的攻擊。過去，蘇聯指摘中共、美國、日本搞三角軍事同盟；緊張緩和後，蘇聯改口攻訐美、日、韓三角聯盟。如今，又責中共與美、日、韓進行軍事搭訕^㉚。如前所述雷根訪問大陸，中共轉播他的講演詞時，把攻擊蘇聯一節也予以刪除。但蘇聯對於中共與美國的經濟、軍事合作仍感憤怒，那會促使莫斯科愈益加緊增強其在太平洋地區的軍力，加快它在越南和阿富汗的行動，對中共並非有利。

美國副總統布希爲簡報美國同中共交往情形而訪問亞洲，印尼外長莫查達（Kusmaatmadja Mochtar）提醒他，美國與中共交好的同時，不應忽視東南亞國家的和平與安全。印尼總統蘇哈托（Suharto）則再度聲明，印尼現在不準備與中共復交。印度總理甘地夫人對於美國與中共及巴基斯坦的關係，也頗有微詞。而馬來西亞外長蓋沙里（Muhammad Ghazali）則告訴美駐聯合國大使寇克派屈瑞克夫人（Jeane J. Kirkpatrick）申明東協立場：阻遏蘇聯對亞洲擴張，永勿讓中共當「主要角色」^㉛。這些都可證明，亞洲國家對中共缺少信心，它們也不願見未來的太平洋世紀，在太平洋地區有兩個共黨強權的出現。反轉來說，中共拉攏亞洲國家對付蘇聯及越南，將會出現更多問題。

最近，蘇聯對美態度強硬而僵化，也許是想在美國大選中造成不利於雷根的形勢。當然，它的企圖未必得逞。不過，最初搞「談判時代」、「多元均衡外交」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森，曾經爲文說：「如果在本世紀所餘下的年份裏，和平仍能保持，美國就必須達到兩個必不可少的目標。美國必須同蘇聯發展一種共同生存的關係，同時必須繼續建立和加強一九七二年同中國所建立的關係」^㉜。我們不知道尼克森提出一九七二年有沒有其他用意，但他要求美國與蘇聯及中共同時保持某種關係，確是一種玩牌的技巧。到了那一天，美國在蘇聯與中共之間如何選擇？如何運用？就會自如得多了。不過，我們也該有一項最低要求，美國對它和蘇聯及中共的關係不論如何玩法，總不該傷害到自己以及自由世界的利益。

^㉙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九日）第二版。

^㉚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四年四月廿一日）夕刊第一面。

^㉛ 美聯社：〔一九八四年五月廿二日〕吉隆坡電。（臺北：〔中央日報〕（同月廿三日）第五版）。

^㉜ 尼克森：〔新中國牌〕，美國：〔新聞週刊〕（一九八四年四月三十日，提前出版）。轉自香港：〔文匯報〕（同月廿五日）第一版譯文。